

山西票号史

卫聚贤

经济管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晋商研究经典文库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主编 鄧

—北京：经济管理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305-13888-8

Ⅰ. 晋… Ⅱ. 鄧… Ⅲ. 晋商商业史—研究—山西省 Ⅳ. F71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8888 号

出版发行：经济管理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10 号中雅大厦 5 层

电话：(010) 68026208 邮编：100045

印刷：北京印刷厂 经销：新华书店

组稿编辑：杜菲 责任编辑：杜菲

技术编辑：晓成 责任校对：超凡

封面设计：张瑶 印刷：16 开 25.5 厘米 32 页 1.5 万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全册定价 15.00 元

书号：ISBN 978-7-305-13888-8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印装错误，由本社读者服务部

负责调换。联系地址：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10 号

电话：(010) 68026208 邮编：100045

山西财经大学
《晋商研究经典文库》
编委会

学 术 顾 问：孔祥毅摇张正明

编委会主任：杨怀恩摇原梅生

编摇摇摇委：樊而峻摇郭泽光摇赵国浩摇崔满红摇王摇森

摇摇摇摇摇摇黄鉴晖摇葛贤慧摇武三林摇阎应福摇孙长青

摇摇摇摇摇摇张亚兰摇王永亮摇乔摇南摇陶宏伟

主摇摇摇编：崔满红

编辑部主任：王永亮

编摇摇摇辑：陈摇啸摇薛秀艳摇杨志勇摇侯海燕

总摇摇序

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，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，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、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。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，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、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，在经济、管理、社会、艺术、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。

学术界对晋商的关注始于清末民初。民国时期，涌现出了一批关于晋商——特别是票号——的史料汇编、调查报告、论文、论著，比如李宏龄的《同舟忠告》（民国六年太原监狱石印）和《山西票商成败记》（民国六年太原监狱石印），韩业芳的《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》（民国十年煤油印），双一的《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·山西省》（《钱业月报》第二卷第十二号），严慎修的《晋商盛衰记》（民国十二年铅印），东海的《记山西票号》（《银行周报》第一卷第七、八号连载），范椿年的《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》（《中央银行月报》第四卷第一号），卫聚贤的《山西票号之起源》（《中央银行月报》第四卷第六号）、《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》（《中央银行月报》第六卷第三号至第七卷第二号连载）和《山西票号史》（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，~~民国~~1935年出版），秦省如的《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上之地位》（《钱业月报》第十五卷第七号），陆国香的《山西票号之今昔》（《民族》第四卷第三期）和《山西之当质业》（《民族》第四卷第六期），蒋学楷的《山西省之金融业》（《银行周报》第二十卷第二十一期），侯兆麟的《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》（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

• 山西票号史 •

刊》^{〔1〕}（1947年冬季号），李渭清的《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》（《中央银行月报》第六卷第二号），陈其田的《山西票庄考略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47年出版），等等。这些文献既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，本身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，堪称经典。然而，这些文献原件印行、出版的时间均已久远，现存世稀少，且纸张脆化，墨色退变，会越来越严重地限制着其对后人学习、研究的作用。

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类高等学校之一，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。经济学、管理学始终是学校的优势学科，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。近年来，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、突出办学特色，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，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、弘扬晋商精神、构建学科体系、培养商科英才作为办学指导思想，并加大了各项投入，在科学研究、课程改革、教材编写、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。为了便于学界同仁学习和研究，把晋商文化教育和晋商史学研究工作推向深入，我们对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，编辑成册，资助出版了这套“晋商研究经典文库”。

文库首批共有五册，分别是：

卫聚贤著《山西票号史》。根据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 1947 年版重印。原书为繁体竖排，重印时改为简体横排。另外，原书末附录有 10 篇（包括文后附文共 15 篇）文稿，为了方便读者查阅，并出于对原作者的尊重，我们在编辑时将这些文稿抽了出来，汇集在本文库之《晋商研究早期论集（一）》中，本书末只列有附录文稿的目录，不再重复文稿内容。

陈其田著《山西票庄考略》。根据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重印。原书为繁体竖排，重印时改为简体横排。

《中国实业志·山西省·金融》。根据（民国）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《中国实业志·山西省》（华丰印刷铸字所 1947 年版）第八编“金融机关”重印。

《晋商研究早期论集（一）》。汇编了关于山西票号的调查报告、论文、信函、演讲稿等共计 100 篇。

《晋商研究早期论集（二）》。内容包括专门讨论山西金融业的论文、调查报告，涉及山西票号的论文、调查报告，关于汉口、库伦、营口等晋商活动重镇的商业金融问题的调查报告和论文，作为票号衰落时期背景知识的有关文献，共计 猿苑篇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为尊重历史事实，保持原书风貌，在本文库的编辑加工过程中对原书的文字表述、体例、年代及数字表示、计量单位等均未作改动。此外，本文库的出版纯为学术研究之目的，加之出版在即，时间紧迫，虽经编委会一再联络，亦未能与上列个别著作权人及单位取得确切联系，相关事宜请致信本文库之编委会。

希望本文库的出版对社会各界有所裨益！

杨怀恩摇原梅生
圆园园苑年 猿月 猿日

序

余在山西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时，曾听韩业芳及严慎修讲过山西票号故事，但其时票号事业已失败，余以为这是历史上的陈迹，因余时尚未研究经济史，故未注意及此。后各省友人闲谈中，以余为山西人，而又研究历史，也曾研究经济史，故尝以山西票号之故事为问。尤其是顾炎武发明票号一节，人多乐道之，而余所闻为雷履泰所发明者异。但孰为票号发明者，则未暇究。

二十五年奉命赴山西调查票号，所得材料甚多，略加整理，分期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出版之《经济月报》中发表，目的是印成单行本若干，寄回山西太谷、祁县、平遥赠送曾在票号中工作过的人，以求校正其错误，补充其材料。结果因全面抗战，所得补充的材料甚少，于是编成山西票号史，分订为上、下两册。

山西票号史两册，只有稿本一本，没有副本，跑警报时也要带上跑，怕轰炸了以后再编不起来了。又明知其中遗漏错误甚多，请教别人吧？也是因为只有原稿本一本，在此轰炸期间不放心。出版吧？又怕遗漏太多而不宜。是以牵延至今，现在才决定出版了。

原稿中照相及会票等，需要作铜版锌版的，现在一概省略了。这是因为这仍是稿本，不过印上四千本，送对于票号有研究的人看过，加以校正与补充。纸型也多打一付，保存下来，待抗战胜利后，再版若干本，送到山西太谷、祁县、平遥去，以作我第二次调查山西票号之蓝本。

票号的发明人，传说是顾炎武，经我的考证，顾炎武与傅山及戴廷枏为推翻清室做革命工作而创设标局。标局是代商人运现，票号是抵制标局运费之大而设的。票号是谁发明的？传说是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经理雷履泰，但无直接证据。而山西金融之中心，确系太谷，即以标期而言，山西

• 山西票号史 •

之标，分为两种；一为太谷标，即太谷一县之标；二为太汾标，即太原府所属之祁县、榆次，与汾阳府所属的平遥、介休之标。在地域上讲，太谷也不是独偏于东而另划分一区，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势力，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、祁县、平遥、介休等数县，故独为一标。且各路运汇来之现银，先集中太谷；办收交，开利率，悉以太谷为先为准。又省库所收之银，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之“孟合”二字，即当做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。票号固以汇兑为业务，而资本不雄厚，则不能运现以接济，余调查票号时，太谷县协成乾票号股东孙培基对余云：“票号是太谷先发明的，约在乾隆年间”，其人为举人而善于掌故，其所云不能无因，但究竟如何？尚待第二次之调查。

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、协成乾，志成信为最老，协成乾系志成信之伙友分设者。志成信在外设有标局，名曰志一堂，系送现银，有账可稽者在道光年间，且该票号在北京仍用志一堂名号。是志成信在太谷票号中为最古。志成信之股东有孔行素堂者，即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。孔庸之先生之家也。其家人多有习票业者，咸丰时有孔宪仁先生为志成信之股东兼经理，对志成信业务曾大为扩充也。票号在昔时为最完善之金融机构，孔庸之先生承其家学，而应用于现今之财政，此抗战以来财政之所以有办法者即在此也！故余将山西票号以历史的眼光先编为《山西票号史》一书，至票号中之奥妙，余为门外汉，有待于将来补充本中说明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一日
卫聚贤记于说文社之聚贤楼

编纂经过

山西票号兴起于道光初年，失败于民国初年，在这八十年间，对于汇兑通畅，调剂各地金融，代理国库，协助政府财政，在银行未成立之前，而有此大规模之金融机构，实为中国经济史上之重要阶段。但尚少有系统的记载，以明究竟。中央银行总裁孔庸之先生，对此特为注意，于民国二十五年冬派贤从事调查山西票号事迹。

当余调查票号时，未有对于票号有系统的书籍出版，以资参考，是以先从访问着手，对于票号的名称，成立及歇业的年月，资本数目，几年一账，普通每股每账开银若干两，最多开过若干两，股东某人，经理某人，系某县某村人，将此概况在商会招集曾在票号为经理者询问，又到各股东家中去访问。

为证实各票号成立的时期，在太谷、祁县、平遥各地大庙中将碑文看过，有无票号的名称在上，但是由山西教育厅通令府十县所抄之碑文，多抄其序文，而将布施人未抄，是以查不出票号的名称。

票号的股东及经理已故的，因欲从其生卒年月上知道一点票号的事迹，乃至各家，阅其家谱，看其本主，并搜集其墓志，亲至墓上抄其墓碑。又请其后人或其亲友代为作传。

票号中各种账簿，报告清册，往来信稿，以至会票执照等，均为票号史中重要材料，乃为搜集。至于票号门首之招牌，多为拍照，印章多为盖过。房屋以及股东经理之住宅，大部分皆照过相。

因无参考资料，余亦非票号中人，故搜集材料时，漫无目标，见到材料就搜集，即将这些材料运到上海从事整理，感觉需要的未搜集到，不需

• 山西票号史 •

要的搜集到一大批，乃赶快整理出一部分，先在中央银行《经济月报》上发表，将发表过的印成单行本，寄到山西太谷、祁县、平遥各商会转票号股东经理等，请其改正补充。但不久全面抗战事起，邮路不通，故未能得到补充及修正的材料，是以将前次所得的材料，编为《山西票号史》一书，拟先发表，作为蓝本，待抗战胜利后，再去详细调查，出一较完全的《山西票号史》。

卫聚贤记于上海

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一日

目 录

一、历史	员
(一)票号的前身	员
(二)票号产生的原因与时代	远
(三)票号的盛衰	怨
二、概况	缘
(一)太谷帮	缘
(二)祁县帮	愿
(三)平遥帮	愿
(四)外帮	苑
三、组织	愿
(一)成立	愿
(二)资本	猿
(三)人员	猿
(四)待遇	猿
(五)红利分配	猿
(六)分号的设立	猿
(七)账簿	源
(八)各路平码及会票	猿
(九)号规	猿
(十)行会	苑

四、人事.....	愿
(一)首创票号的雷履泰	愿
(二)日升昌股东李二魔子	愿
(三)继创票号的毛鸿翔	愿
(四)后起之秀的刘庆和	愿
(五)票号最多的侯魁	愿
(六)力主票号改为银行的李宏龄	愿
(七)主张改银行不成退隐的张石麟	愿
(八)天成亨经理侯王宾	愿
(九)协成乾广东分庄老板马应彪	愿
(十)志成信经理齐梦彪	愿
(十一)调度适当使票号保存至今的高钰	愿
(十二)各票号经理事略	愿
五、业务	愿
(一)票庄的营业报告	愿
(二)从往来信件中观察营业状况	愿
六、附录	愿

一、历史

一种事业的产生与消灭，不是凭空出来的，是从环境需要而形成的。山西票号，产生于道光初年，失败于民国初年，兹将其产生与失败因果的关系，列举如下。

（一）票号的前身

票号的产生固在道光初年，但其产生的原因，则与中国历代货币制度有关；而近因则系戴顾等人为民族革命，创设标局，为票号的前身。远因固有货币史，不宜细载，而近因无直接史料，亦不能详述，兹为简略说明如下：

货币的演变

古代以物易物，不用货币，后来为交换便利起见，则有硬货币的产生。硬货币因用贝壳做饮器，而有“贝币”；由贝币用仿造的则名“蚁鼻钱”。因用石铲为农具而有“铲币”；后仿造的名“布”。因用刀割物，则亦以刀为货币。因用石的或铜的纺织轮变成环钱，先是内外皆圆，后因币面摩擦，减少其分量，改为方孔，用方木棍穿入其中，古币至秦始皇而废（王莽时，曾一度用过），惟方孔的环钱，通行至清末。古货币多铸地名，后加法定价值，至秦汉纯用法定价值，如半两、五铢之类，至刘宋始铸年号，后世的也只铸年号，惟清末铜元上则有将铸地、年号、法定价值三者均列出的，此皆为铜币。虽其间有铁铸、铝铸，但皆名之为钱。若金之用，始自战国，状如饼形，上盖铸地之印。银之使用，较金为后，而形状亦如饼，但为长圆形。宋名为铤，至元代始铸成“元宝式”，约重五十

两，清初在新疆铸币约重一两，清中叶，东南沿海多用外国银币，清廷亦自铸，重为七钱一分，广东并铸有二角、一角的辅币。民国以来，铸有袁世凯像、孙中山像等银币，也有一角等辅币。民国二十五年，改用法币，白银收为国有，另铸二角、一角、五分的镍币，一分、半分的辅币。

交易日繁，因硬币产生不易而用软币，春秋战国时有“皮币”，形不可考，惟汉武帝时以鹿皮为之，其性质等于现在的划条。东汉用布为之，六朝则有“枋柜”于大寺院中，存放现款，由寺院开一收条，存款者持此收条交易，交付货款，其性质等于现在的支票。唐时政府于长安东西市设枋柜，存入现钱。而收保管费，又商人从各地至京师时，将现钱交各道进奏院或诸军使，领取合券，到京师取现，名为飞钱，其性质如现在汇兑。宋时四川商人王昌懿等十六家，设交子铺，凡商人以现钱交给交子铺，交子铺用同一色纸上印树木人物，以无记名式填入钱数，押字盖章，交给付钱人，远近使用，称为纸币。后由宫廷收回自印，因纸张不良，每届三年，以新钞换旧钞。元明两代，甚为通行，清在顺治及咸丰时曾一度使用，至清末，大清、交通银行成立，发行纸币。民国以来，发行纸币之银行甚多，民国二十五年以中央、中国、交通、农民四行的纸币为法币。

山西票号的成立，就是因标局转运硬币不便，改为软币的会票，其方法当有采取飞钱交子的。

■ 李自成的遗金

山西祁县戴光启，于明末宣抚陕北，仕于河南，但未久致仕而卒。其子戴运昌（止菴）为河南尉氏令。当戴光启巡抚陕北，惩贪奖贤，为人民所爱戴，后因大旱，而贪官污吏又压迫人民，因而李自成等铤而走险。李自成进兵河南，对戴光启后人戴运昌优待不杀，戴运昌遂降于李自成。李自成进兵山西，惟对戴光启的家乡祁县，未杀一人。及李自成破北京，亡明社稷，戴止菴以父子仕明，悔降于李自成，因自蔚氏归，羞见家乡父老，未入祁县城，在祁县南麓台山中筑屋自居，卒于康熙六年。

“四月三十日，自成西奔，无他伎俩，到处先用贼党，扮作往来客商，四出传布，不杀人，不爱财，不淫，不掠，公买卖，免钱粮，且将富家钱分账穷民，颇爱斯文秀才，迎者先赏钱币。山陕秀才，益信为真”（见《明季北略》二十卷之八十八页）。亦可作戴止菴降李自成之旁证。

李自成入北京，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拷打求金银，及李自成自山海关败归，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，熔铸成饼，每饼重约千两，共数万饼，用骡车载走，清兵进至定州，李自成败伤，过平定州后，清兵未追。李自成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，杀人太多，恐败兵之后，再遇暗算，乃沿南山行走，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，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，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，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。

按孙郅的家谱是：

孙高山—旺庵—有龄—陈笏—郅—淑伦—继先—廷典—步城（现年二十一岁）

孙高山生于康熙十五年，卒于乾隆二十三年，孙家河村西北，有孙高山墓碑云：“家道中落，未有厚产……乃走关东，经营产业，渐积万金。”

孙家在高山时，“家道中落”，在高山之父或祖，其家道必富，是孙高山之父或祖，有拾李自成遗金的可能，但大宗遗金，则在戴家。

李自成自受伤后，弃马乘轿，见清兵不追，到祁县麓台山，在其故臣戴运昌处休息，感其先人戴光启在陕的功德，又受戴运昌的招待，送给戴运昌的现银不少。戴运昌后将其银交其子戴廷枏，做革命的工作运动。

江苏崑山县人顾炎武，在江南谋革命不成，到山东不能立足，乃至山西与傅山为友，傅山号青主，山西太原人，其祖母系明朝的公主，故与顾炎武和戴廷枏联合起革命，戴廷枏在祁县城内建立三间四层楼的“丹枫阁”。

丹为红色，枫树到秋天其叶红色，含有“朱洪”二字义，阁与武系音转（如武与物音同，物亦读如窝，窝音近阁），系暗射此为纪念“朱洪武”而设，丹枫阁记言梦见古衣冠人，指明明朝，是丹枫阁为革命策源地，已无疑问。而且有傅青主、傅须男、白居易、胡季子、薛文伯、张中宿、李凤皋、石亮四、黄石齐、马君当、阎古古、顾宁人、汪荅文、杨犹龙、王山长、施愚山、宋牧仲、吴鹿友、唐采臣、王贻上、魏环溪、冯大木、田兼山、朱小晋、李孔德、阎百诗、范彪西等“天下名士，南方多集冒巢氏水绘园。北方则丹枫阁称极盛焉”（戴廷枏墓志铭，见《祁县县志》）。

丹枫阁建筑之宏大，丹枫阁食客之多，而且阁中藏书鼎彝（《丹枫阁记》，见《半可集》）又“丹枫阁藏版，海内共知”（戴廷枏墓志铭），丹枫阁主人戴廷枏财产之富于此可知。而傅山为戴止菴传云：“棺外无余物”其父既如此之穷，其子未经商致仕，何以突富？其财当有得自李自成的可能性。

镖局的成立

戴廷枋、顾炎武、傅山等均文人，如何能完成革命事业，谋招徕武人为助，但恐清廷注意，利用山西人民长于经商，从保护商人及代替商人转现现金，雇佣武人为名入手，于是组织“标局”。

标局是雇佣武术高超的人，名为标师傅，腰系标囊，内装飞标，手持长枪（长矛）于车上或驼轿上插一小旗，旗上写标师傅的姓，沿途强盗，看见标帜上的人，知为某人保标，某人武艺高强，不可侵犯。重在旗标，故名“标局”。标局分春夏秋冬四季运现至山西太谷县名“太谷标”，又运至祁县、平遥、汾阳，名“太汾标”，此时名为标期，又称过标。

标局是什么时代设立的，《万籁声武术汇宗》（《商务本》）云“考创设标局之鼻祖，乃系清乾隆时，神力达摩王之老师，山西人神拳无敌张黑五者，请于达摩王，转奏乾隆，领圣旨，开设兴隆标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，嗣由其子怀玉，继以走镖，是为镖局之缟矢，故镖师父走镖时，有‘黑五’口号者，即看对方是否为张黑五门下之友朋孙徒也”。按戴廷枋卒于康熙三十年，标局之成立，当不在乾隆时代。

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先生在他作的《磨难曲》第二十二面，有一段关于标局的记载：

“……那一位山西小举人，便问‘听说贵省大乱，年兄怎磨来？’举人说：‘乱处是太原和平阳，小弟来时雇了二十名标枪，送过平原百里外，就好了，我自己就来了。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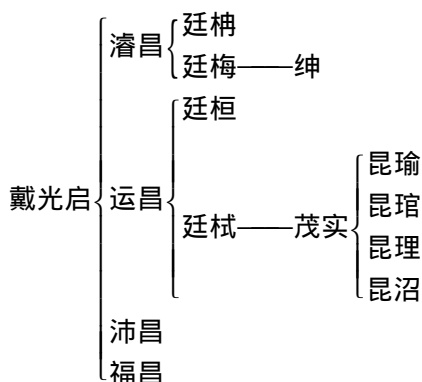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所谓“标枪”，“标”为“飞标”，“枪”为“长枪”，是保护行旅的，后时名为保镖即此。《磨难曲》是什么时候作的？《聊斋文集》卷上元配刘孺人行实云：

“松龄年七十，遂归老不复他游，先是五十余，犹不忘进取，孺人止之曰‘君须复尔’倘命应通显，今已台阁矣，山林自有乐地，何必以肉鼓次为快哉！松龄善其言，领儿孙入闾，福心不能无望，往往情见乎词。”

据此，《磨难曲》系蒲松龄于五十岁时作。按蒲松龄九十岁为康熙二十八年，正在戴廷枋死前二年。是标局发源于山西〔按道光二十四年蔚泰厚京都与苏州八月二十日信稿中云：“今伊逢吉动身，跟标车三辆，每辆装标箱八只，共计二十四只，计实合足六万八千六百两，又九九松江银

五千四百两，统共合咱平银七万四千两，随开去号码一折，到日查收……随带去盘费银两百五十人，至于车价，每车京钱八千五百文，标兵三人，每人工价银十八两，酒钱在外。”九月十八日信云：“咱与日升昌沈标，俱归于志一堂运苏，大约不远，大德玉隆和又有锦标来京，交蔚丰等。”七月初十日信“东口十月标”，十二月十五日信“万金号……冬月初九日起信云：月息，春标九厘，秋标七厘，长标无市”。由此可知在道光二十四年时，标局有志一堂（即志成信），运标有标兵，每年标期分为春夏秋冬四期]，且在戴廷枋、顾炎武、傅山谋起革命之时。标局为顾炎武等计划而设，后由标局产生票号，故山西人相传票号为顾炎武所计谋，非是。

此外尚有“形意拳”可证，《武术汇宗》四五页云：“行意拳法，传于山西白先生，（遗其名）后有郭芸生者，精于此拳……分为十二形，为‘龙虎猴马鸡燕龟蛇鹰熊’是也……”按此拳传自戴家，白戴声近，为万君所误听，按戴家世系是：



形意拳——祁县传为戴大旅和戴二旅所创，大旅或即廷桓，二旅或即廷枋，云此法从岳飞传下，兄弟二人在河南从老道人中学习，在十家店经商，有一二百土匪抢掠，被兄弟二人赶走，由是出名（《续小五义》中的老西白眉毛徐良，为山西祁县人，是由形意拳出名的），其传授高徒是：

戴二旅……戴良栋

李老农——车二——常友儿——戴达
乔润溪